

张治中与五星红旗的诞生



重庆谈判结束,张治中(右二)陪同毛泽东返回延安。

国旗应征图案 38幅符合条件

从1949年7月中旬开始,《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大众日报》等全国各大报纸连续刊登《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歌词启事》,向海内外公开征求方案。至8月20日截稿日期,共收到应征国旗稿件1920件,共有图案2992幅。

征得的国旗图案大体可分为四类:1.镰锤交叉(或称镰刀斧头)并加五角星。此类图案最多,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就设计了中国式的镰刀斧头图案。2.嘉禾齿轮代表工农联盟的图案。3.两色或三色的横条、竖条加镰刀、斧头或五角星的

图案。4.以红旗上排列五角星图案,或者红旗中加五角星并加一两条黄杠代表黄河、长江等。朱德总司令和著名学者郭沫若就设计了此类图案。

经过反复研究,大家一致认为前三类图案不合国体,不能采用。较为可供参考挑选的为第四类。经过精心选评,从中选出符合条件的38幅图案。

国民党元老张治中 反对一颗大星一条杠的图案

上海曾联松设计的国旗图案被编为“复字三十二号”,草拟的说明是:大五角星表示中国共产党,周围四个小五角星表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但有人认为四个阶级的提法不妥:“资产阶级怎么能进入社会主义呢?”

曾参加过国共和谈的国民党元老张治中,坚决反对采用一颗大星一条杠的图案,但他的意见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听说朱德和郭沫若也都很好看这一幅图案,以他们

二人的地位和威望,“星杠组合”方案通过的可能性较大。张治中非常着急,一贯敢于直言谏上的他,决定寻找机会直接向毛泽东陈述自己的看法。

9月2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宴请参加新政协会议的代表们。席间,张治中趁着间隙轻声对毛泽东说:“主席,我只是想问一下,你同意哪一张国旗的图案?”

毛泽东很直接地回答了张治中:“我同意一颗星一条黄河的那一幅。”刚说完,毛泽东就敏感地意识到了什么,突然把话锋一转:“你的意思呢?”

“我不同意!”张治中回答得很干脆。

“为什么?”毛泽东感到有些意外,因为大多数的代表都赞同这个方案。

“你不是说要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吗?在国旗上画一道杠,有把国土一分为二之嫌!再说,用一条杠子代表黄河也不科学,老百姓会联想到孙猴子的金箍棒!”张治中一口气说完自己想说的话。

听完了张治中的话,毛泽东边笑边点头说:“这倒也是个问题!”“你的话也有道理。这样,我再找

时间约大家来研究研究吧!”毛泽东认真地对张治中说。

五星红旗图案被确定为国旗

9月25日,张治中接到通知,毛泽东和周恩来请他一起去开一个座谈会,他立即前往。会议一开始,大约有三分之二的人赞成黄河的图案。毛泽东说:“张治中先生觉得这个图案有把国家一分为二的嫌疑,而且也容易使老百姓产生错觉,把这条横杠当成孙猴子的金箍棒而不是黄河。仔细想一下,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大家认为呢?”

最后,参加座谈会的代表一致赞同毛泽东的意见。“我看还是32号好!”张治中迫不及待站起来发言。梁思成也站起来发言说:“我觉得‘复字三十二号’图案很好,多星代表人民大团结,红色代表革命,表示革命人民大团结。”其他与会代表也纷纷发言,赞成“复字三十二号”图案。这样就初步确定了五星红旗的图案,但去掉大星中的镰刀斧头。

9月27日下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通过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摘自《世纪风采》)



1978年10月,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李光耀到机场迎接。

邓小平的一次伟大的认错

1978年10月,邓小平访问新加坡。而这之前,中国在极左时期一直称新加坡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当邓小平吃惊地看到新加坡的成就时,他承认对方实行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的方针是对的。

当谈到中国的对外方针时,李光耀(时任新加坡总理)说,中国必须停止革命输出。邓小平停顿片刻后突然问:“你要我怎么?”李光耀大胆地说:“停止马共和印尼共在华南的电台广播,停止对游击队的支持。”

李光耀后来回忆:“我从未见过一位共产党领袖,在现实面前会愿意放弃一己之见,甚至还问我要他怎么做。尽管邓小平当时已经74岁,但当他面对不愉快的现实时,他还是随时准备改变自己的想法。”

一个时代的失误,总得有人来画个句号,另开新篇。只有那些敢于担起世纪责任的人,才会有超时代的思考。

这次新加坡之行,邓小平以他惊人的谦虚代表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承认并改正了两个错误。一是改变保守自闭,主张对外开放,引进外资;二是接受建议,不再搞革命输出,大大改善了中国的对外关系。

(摘自《党建》)

“北京时间”为何在陕西发布

1966年3月26日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召开国务会议,把建设我国标准时间授时台的计划正式确定下来,随之面临的重大问题便是选址。

周恩来总理亲自组织抽调了通信、计量、天文、地理、数学等领域的百余位科技人员着手确定我国的时间基点。

科研人员的足迹踏遍大江南北,核算出了数万组数据,终于在1970年正式建立了具有我国特色的频率授时服务功能系统。

按照国际惯例,各国的标准时间一般都以本国首都所处的时区来确定。北京处于国际时区划分中的东八区,同格林威治时间整整相差8小时,而我东西相跨5个时区,授时台必须建在中心地带,从而也就产生了长短波授“北京时间”的发布不在北京,而在陕西蒲城。

蒲城地处大陆腹地,离中国大地原点仅100公里,发射的时间信号便于覆盖全国;当地地质构造稳定,授时中心因地震等自然灾害被毁坏的系数极小;由于其重要性,建立在内陆地区比较安全。

1970年12月15日,国家授时中心开始向全国进行短波广播。在半径达3000公里的范围内,人们第一次从收音机里听到日后耳熟能详的“嘀嘀”的报时声和“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x点整”。

当时几乎没人知道,“北京时间”是从陕西这个神秘的报时大院播出的。

(摘自《周末》)

许世友“生财”有道

许司令在南京时养鸡就很出名。1973年来到广州后,许世友早就盯上了别墅后面的那片竹林,命人围好后,他就从南京把100只良种鸡运来,圈在竹林里放养。因为这些鸡他都侍弄过,所以哪只快生蛋了、哪只身体不适,他指指点点的如数家珍。

他还亲自教工作人员把吃剩的骨头和鱼刺敲碎,拌在饲料里喂鸡,每天至少给鸡喂一次青菜。果不其然,他养的那些鸡个个精神焕发,生的蛋也特别大。有一只蛋居然3两多,打开里面有3个蛋黄。这件事后来越传越神,慕名前来参观许世友养鸡的人越来越多,还有人联系买鸡蛋。“我这里又不是养鸡场,参观什么!”许世友虽然拒绝参观者,但对于买来鸡蛋的却区别对待,他告诉



许世友在练功。

工作人员:“一定要问清楚,如果买鸡蛋用来吃,多少钱也不卖,如果是用来孵小鸡的,无偿奉送。”

许世友在广州住在留园7号,院内道路两旁立着一排排

葱茏繁盛的白玉兰树,每到开花季节,清香扑鼻,满园生辉。许世友看到园丁每次都把飘落的花瓣收拾起来带走,觉得奇怪,就问其缘由,园丁不好意思地回答:“卖掉,换几个零花钱。”许世友好像又发现了一条生财之道一般,急速号令工作人员集合,采摘玉兰花。他坐镇指挥,大家一起动手,有上树摘的,有在地上用钩子钩的,很快就将十几棵白玉兰树的花采摘完毕了。

大家将采下的白玉兰花卖到收购站,一个花季就赚了五六百元,这在上个世纪70年代可是一笔不小的财富。许世友安排给每个工作人员买了一件时髦的确良衣服,剩下的就用来改善伙食了。

(摘自《中华儿女》)



胡耀邦和孙子、孙女在一起。

胡耀邦改讲稿

1953年7月,胡耀邦率领中国青年代表团,赴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参加第三届世界青年联欢节。7月26日,胡耀邦听说《朝鲜停战协定》将于次日正式签字,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世界瞩目的大事。

在这一消息得到证实后,胡耀邦立即决定,他将在次日(7月27日)举行的世界青年代表大会上讲话时,宣布这一重要消息。于是他连夜改写讲稿,认真斟酌词句。代表团里有些同志出于好意,劝阻胡耀邦说,讲话稿是出国前经中央批准的,按照当时的外事纪律,是不允许自行改动的。胡耀邦认为,我们取得了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是当时最重大的国际事件,这是新中国第一次战胜美帝国主义。世界青年代表大会这样一个重要的国际会议,必须由中国人来宣布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

当时,苏联共青团第一书记、苏联青年代表团团长谢列平来找胡耀邦,谢列平要求将原定胡耀邦讲话的时间让给朝鲜代表团团长先讲。胡耀邦明确地对谢列平说:“原定的会议日程绝不能变,还是应由中国代表团先讲。”胡耀邦深知,这件事关系到祖国的荣誉,关系到百万志愿军指战员浴血奋战的功勋。

7月27日,胡耀邦走上了世界青年代表大会主席台,他高声宣布:“今天,《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了,这是中朝两国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共同打败帝国主义的伟大胜利。”他的话音未落,整个会场沸腾起来,各国代表团纷纷向中国代表团祝贺,部分代表甚至把胡耀邦抬起来欢呼。

胡耀邦回到北京后,毛泽东对胡耀邦伸出大拇指说:“你这一回在国际上出了个大风头,讲得好啊。”

(摘自《文摘周报》)

开国时期的献宝热潮

1949年,神州大地翻天覆地。读书人的神经尤其敏感,他们纷纷拿出私藏的宝贝,新中国第一拨献宝热潮遂告形成。

1949年4月28日《人民日报》发布了一则不同寻常的嘉奖令:“北平军管会通令嘉奖贺孔才先生捐献图书、文物的义举……本市贺孔才先生于解放后两次捐出其所有图书、文物,献给人民的北平图书馆及历史博物馆,计图书12768册,文物5371件。贺先生忠于人民事业,化私藏为公有,首倡义举,足资楷模,本会特予嘉奖。”一下子震动了中国文坛界。

贺孔才出身书香世家,自幼饱读古文学,是传世古籍和文物的收藏家,当时担任文化部文物局办公室主任。

1949年8月底,报上又传

来消息:“继北平贺孔才先生献出图书文物之后,近又有天津启新洋灰公司总经理周叔弢先生与霍明治先生献出珍藏之图书文物……周叔弢先生将他用二两黄金买来收藏的海内孤本宋版‘经典译文’交由北大唐兰教授转送高教会。霍明治先生将他毕生收藏的图书共10790册及珍贵的金石漆器等文物捐献给政府……华北人民政府对两位先生此种化私藏为公有,裨益人民的精神,认为应该表扬,已准由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分别发给‘褒奖状’,以资鼓励。”

为了配合开国盛典,北平一解放就启动了文物宣传,从8月起先后举办了“帝后生活史料”、“抗日史料”、“美帝侵华”、“赵城藏”、“人民捐赠文物”等11项文物展览;其中“人民捐

赠文物”,是北平解放半年来各界人士捐赠的16962件文物的一小部分。11月4日,清华大学又举办了“台湾、西藏及西南少数民族民族文物展览”,展出的500多件珍贵文物中有200多件台湾高山族文物,包括木、竹、陶、皮革等材料的宗教法器、房屋构件、饮食器皿、武器、衣饰和书籍资料等等,都是丁惠康所赠送。

清华大学举办此次文物展览,独缺台湾高山族文物,于是专程找到丁惠康,请求借作“庆祝解放展览”。丁惠康慨然捐赠了收藏的全部高山族文物。接着又向故宫博物馆捐赠了全部家藏。

如此的献宝热潮,一直持续到“文革”前。

(摘自《报刊文摘》)